

对杜定友先生“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 講稿”的几点意見

李 默 方振球

1957年广东省举办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杜定友先生担任了“地方文献工作”一课的讲授。在他的講稿中，我們認為有几点需要拿出来同同志們討論。

(一)該講稿沒有明确地提出地方文献工作的方針任务，而只引述了苏联图书馆对于地方文献的重视与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这是不够全面的。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工作的組成部份，它必須遵循图书馆的方針任务，即必須为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科学研究服务，必須宣传本地区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指示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必須教育与鼓舞全省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热情。否則，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就会失去意义而陷入“为地方文献而地方文献”的錯誤。为什么杜先生沒有論述这一問題呢？我們且看他 在 1949年5月出版的“广东文化論丛”中曾經写道：“研究乡邦文化，发揚民族精神”，以“建設广东新文化而保存广东文献”，为“洗雪广东无文化的耻辱”……这就是杜先生对于地方文献工作的看法。杜先生既然对地方文献工作持着这种不正确的地方主义观点，那么他当然不可能全部接受地方文献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針任务。因此，他就不談地方文献工作的方針任务，而着重論述地方文献的保存和陈列方法了。

(二)在收集地方文献的范围方面，杜先生的講稿中充分地表现出厚古薄今的傾向，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引到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歧路。我們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地方文献的收集必定要有明确的范围，而且这个范围应该主要是解放后各个时期生产建設的资料，与历次运动的各种文献。而解放前的部份，应该是对本地区的生产建設、科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但是，杜先生却主张“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記載，包括过去的和現在的”，沒有重点，不分主次，“不論新旧，一律选存”。这种无所不包的收集原則所产生的結果怎样呢？陈旧的多于新生的，古的多于今的，不实用的多于实用的。例如在广东文献室的5,567种（1957年統計数）

广东史料中，解放后的文献资料只占810种（期刊除外），解放前的却占4,757种（其中有很多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这样可以供应各单位研究解放后九年来的建設成就的资料，就感到非常不够。通过整风运动，我們反掉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就在去年补充了一千多种新的资料，而大部份是有关生产建設与历次运动方面的文献资料，大大推动了本省的生产建設和科学研究工作。

其次，杜先生在講稿里列举例子也都用了旧的资料，如講稿中写道：“史料中有‘粤东军变記’、‘珠璣巷民族南迁考’……都是原稿沒有刻过的，著作传记中有未刻稿本，‘葵霜閣遺詩’、‘李忠定公履歷’……有万曆版‘岭南文献’，嘉靖版‘两都风詠’……等善本。在出版中有陈氏薛古堂二十四史、广雅丛書、岭南学报、民俗学刊”。我們不禁要問：为什么杜先生尽情列举这些稿本善本的例子而不列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省港罢工概观等资料呢？这些资料不都很名贵，而且很足以說明广东文献的特点嗎？此外不是还有很多关于解放广州与解放后鎮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普选、生产建設等的最新资料嗎？在地方出版物方面，我館不是藏有“政治周报”、“犁头”、“人民周刊”等，而且还收藏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出版的地下刊物以及解放后各地区的出版物嗎？当然，我們不否定杜先生所列举的图书文献，对我們保存文化遗产及参考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但值得疑問的是，为什么杜先生对旧的文献资料那么大書特書，极感兴趣，而对革命文献和解放后出版的地方文献资料却那么不感兴趣？从这里就不难看出杜先生是站在什么立場来对待和处理地方文献的，他使地方文献成为藏書楼的点綴品了。

此外，杜先生在講稿中談到地方文献的收集时，只是不分主次地列举了九种收集方法。可是，在我們的实践中体会到，广东省的文献资料之所以能够积聚到今天的規模，是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及关怀分不开的。例如53、54、56各年，我們在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与各級地方党委的支持下，征集了一大批文献资料。各地区的出版单位都以呈繳样本或贈送方式送給本館大批出版物，以及私人藏書的捐獻和采訪等等，也都是通过各級党政机关的支持发动而取得的。这不明明是一个主要的来源嗎？可是，杜先生在地方文献的收集方法中并没有突出闡明这一点。

（三）关于地方文献的分类。我們在工作中感到杜先生所編制的地方文献分类表严重地缺乏阶级观点，缺乏思想性与违反科学分类的基本原则。例如，講稿中所列举的：“广东历史类表”，竟把反动的类目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主要地位，把反动派大小头目的极細小事件都列入了类表，而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在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倒置在次要地位，仅仅給予細小的类目，有的甚至沒有类目。这是什么做法？

我們学习现代史可以知道，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0年5月馬克思主义学会广东小組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誕生，并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广东也成立了广东分部。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同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太平洋运输工人會議亦在广州召开。以上都是党成立后的广州工人运动的部份史实。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农民运动也有蓬勃的发展，如：1923年广东海陆丰农民进行減租斗争；1924年广宁农民进行抗租斗争；1925年5月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全省参加农协的农民达至60万人，东江的革命农民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两大支柱之一。广东革命軍在革命的工农群众支持下，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所有这些伟大的工农革命运动，在杜先生的类表中竟毫无反映，找不到应有的类位。而反动的历史事实，如“D 346 滇桂軍攻粵”，“D 364 清党”，“D 366 张发奎”，“D 367 西南政务委员会”与“D 385 敌伪时期”等，却是应有尽有。全部类目，以反映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走狗統治广东的黑暗罪恶历史，为其分类表的主导与主要部份，而且突出了反革命的罪魁蒋介石、张发奎、陈济棠等。

更其使人不能容忍的，是杜先生在这个类表里还歪曲了历史的真相，这主要表现在“D 35 国共合

作时期”的类目安排上。

D 35 国共合作时期

D 351 三大政策

- .1 越飞来华
- .2 孙文越飞宣言
- .3 大元帅府成立
- .4 鮑罗廷
- .5 中共三代会在广州
- .8 国民党改組

D 352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我們知道，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綫的号召。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討論的中心，就是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統一战綫的問題。大会决定了建立革命統一战綫的具体方針。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組了国民党。大会通过了宣言。宣言中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綱領，規定了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的統一战綫的組成，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趋向高涨。

圖書资料的分类，除适当照顧本身的特殊性外，应该依据科学分类的原则。但是杜先生却採用了科学分类的原则，而在历史类表中表现出违背历史分期与割裂历史的做法，例如类表中这样写着：

D 32 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

D 33 历次起义

.....
.....

D 335 庚戌起义 1910

- .1 新軍事变
- .2 紅花崗（溫生財）
- .6 黃花崗 1911.3

D 336 辛亥革命 1911（广东光复）

显而易见，以上列举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史实，而一般的历史分期都是以辛亥革命时期来包括这些历史活动的，但是杜先生却把辛亥革命单单看成是广东的光复。而且对于近代历史时期的命名，不以革命运动为标帜，而以个别人物为代表（如“D 32 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在細小类目中当然

可以考虑)，这种作法也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又在“D 33 历次起义”的类目中，表现出历史时间的颠倒，并把不属于广东部份的事件也胡乱列了进去。例如把“D 332.5 湖南之役”，“D 333.1 湖州之役”，“D 334.7 云南河口之役”等，都列入广东史料，这又何等荒谬的做法。再如，我们知道，庚戌起义就是广州新军起义，温生财刺孚琦是在辛亥（1911）三月初十。而杜先生竟把这两者都归在“D 335 庚戌起义 1910”的这一类目中，由此可见，他对史实的态度是极不严肃的（在历次起义的细表中还有不少相同的例子）。同时，他把“D 329 中国国民党 1923—27”入到“D 32 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请问，这一类目与“D 351.8 国民党改组”、“D 352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间有何区别？这里充分说明了他所编制的类目之混乱。

谈到杜先生在解放后所修订的“广东文献分类表”更是糟透：例如，463.3 三年”，“463.5 五年”之类，竟把国民党时期的“三年建设”、“五年建设”，与我们解放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在一个类目上反映；把我们的“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与国民党时期的省县市议会放在一起；又拿我们的民兵与国民党的地方团队相提并论，共同列在一个类目中；诸似比类。这正好说明杜先生在分类问题上敌我不分，严重地丧失了人民的立场。

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讲稿”中，我们认清了杜定友先生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思想实质。我们可以从他在1948年出版的“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一书（註）中看出他的这种思想的根源。他在书中说明，他之所以编制“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表”，是因为“图书分类是思想系统的表现，分类表的编制，应有中心思想”。什么东西作为他的中心思想呢？他曾从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是唯一完善的最高指则”，以及戴季陶的“大家不肯从各方面用科学方法扶助三民主义的发展……研究伦理的人，不能用严密的批评去纠正一切反三民主义者的错误，”这些反动言论中得到了启示。因此，杜先生就以三民主义作为分类的中心。他写道“作者（指他自己）深受三民主义之感召，痛审已往图书分类的谬误，故倡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之说，以实现学术主义化，与主义学术化”。三民主义中心分类法“对于主义之宣扬尤为实效”，他要“将三民主义渗透在各科学当中”，使“学者在图书馆检查图书的时候，不能逃避三民主义的影响，而深思猛省有以自奋”，以达到其图书分类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杜先生的错误观点和思想方法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註：“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开始编著于抗日战争的中期，1948年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印行（油印本）。当时杜先生兼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

湖北省图书馆召开“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座谈会

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编写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初稿发表以来，引起了武汉图书馆界的极大兴趣与重视。省图书馆特于三月二十七日邀请武大、湖大、科学院等图书馆馆长及武大图书馆学系师生计20余人，进行了为时一天的座谈。省文化局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同志大家一致肯定“概论”的发表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件大喜事。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总结了我国解放几年来图书馆工作的丰富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图书馆学上所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明确了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方针与任务，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它不仅对我国各系统图书馆的实际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

学的理论建设、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以及图书馆学的发展，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对“概论”不足之处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希望。这些意见和希望就是：五四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概况应该谈得详细一点；对省市图书馆谈得较多，对高等院校等其他系统和基层图书馆谈得较少；要求对各系统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分别加以论述；对各项工作方法的论述要求更具体一些；对人民公社图书馆的性质、方针、任务等谈的太少；对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批判还要求更加深刻具体一些；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远景也应该谈到，这样对图书馆工作者鼓舞更大；等等。这些意见与希望，整理后将寄交北京文化学院在修改时作参考。

*大*学*图*書*館*的*图*書*开*架*問*題*

吉林大学圖書館 李樹权

为了更好地开展圖書館工作，我館的同志們提出了不少建議，其中也包括圖書開架問題。这里所謂開架，即是開放書庫，由讀者入庫自行選擇圖書，圖書館員為之辦理借還手續。

我館是大學圖書館，館內設有教師和學生參考室，各系有系圖書室，這些輔助性質的書庫，從來即是開架的。在整風運動中，學習友館的辦法，我們又在自然科學大書庫試行了開架借書。回顧過去所有輔助書庫的借閱工作，看看兩個月來自然科學書庫試行開架借書的結果，我們認為：開架借書的確是有許多優點的。

首先，開架借書對於讀者是方便的。過去，在借書人多時，是需要排隊的，有時還得等上相當長的時間。而且也有這樣的情況：一位讀者從目錄里選好了自己要借的圖書，又排隊等了一陣子，但出納員到書庫去取書時才發現這種書被人借光了。讀者費了很多時間結果是借不到書。有些讀者等得不耐煩，或是沒有時間排隊等候，就只好“乘興而來，敗興而去”了。借書要排隊，等了一陣又不能保證借到書，許多讀者對此是有意見的。而實行圖書開架，允許讀者自行入庫選書，這樣一來，上述的問題就解決了。從借書手續上來說，閉架的辦法借一本書平均需要二、三十分鐘；而開架之後，讀者只用兩、三分鐘時間就可以借到要借的書了。

其次，讀者用書是各種各樣的，有時要通覽全書，有時也許只要摘讀書中的一段。而一冊圖書，從書名或目次上並不能完全告訴讀者，什麼書是他正需要的。管理圖書出納的同志們都有這樣經驗：一位讀者從目錄上自己選了書，當你拿給他時，他只翻一翻就看出不是自己所需要的，結果就不借了。實行開架借書，讀者能親自入庫，可以從不同名稱的圖書中選擇自己所需要的材料，這樣就不會有館員取書往返徒勞的問題了。而且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也發揮了宣傳推廣圖書的作用。因而，開架之後，我館借書的拒絕率立即為之降低。

由於開架借書已不需要出納員為讀者找書和取書，而主要是辦理借還手續，所以不但提高了工作

效率，而且還可以節省一部分人力。在過去，我館的自然科學書庫共有三個經常的工作人員，當開學前後借書人多時還得有外力支援；但最近實行教學改革以來，借出的圖書比過去要多好幾倍，而現在只有兩個人，用開架辦法也就可以對付了。

圖書開架的另一個優點，就是借書量的增加。例如，我館的第一學生參考室（輔助書庫）擁有藏書一萬冊，開架後每日的借還數量常在一千冊左右，這個數字有時超過了幾個借書處的總和。開架後的自然科學書庫，平均出納量也增加了一倍。這雖然主要是由於教學改革的需要，但其中開架辦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開架借書的優點是很明顯的，但在實行開架前，應該注意的問題也不少，主要的有如下幾個：

一、清理書庫和挑選圖書問題。我館的藏書是文理分庫保管的。一般說來，自然科學書籍只有新舊之分，而無鮮花毒草之別，所以很容易地就開架了。但在社會科學書庫里還保藏有一部分內容有問題的圖書，這些資料被做為被批判的對象而保存着，過去一直不向讀者推薦，只有許可入庫的人才能看到，而能入庫的人則都是具有批判能力的。現在，如果要在這樣的書庫里實行開架，首先應該對這些圖書加以清理，根據讀者對象把圖書區分為可以開架的和不能開架的兩種，分別組織藏書，分別管理。

有人認為，社會科學圖書也可以不加分別地一律開架，因為大學圖書館的讀者都是文化程度不低而又有一定批判能力的，否則即為對讀者的不信任。實際這不是對讀者信任與否，而是如何對工作負責：是客觀主義地滿足讀者用書要求呢，還是推捧好書以使讀者受到教育呢？我們的任務當然是后者。因此就不該把那些內容有問題的圖書借給一般讀者，也不能把所有圖書都實行開架。不然的話，開架固然便利了讀者看書和借書，而看了一些有問題的圖書，却也會使讀者中了毒。

從整風運動所暴露出的問題來看，在青年學生中間，思想認識問題也並不都是很單純的。過去已

經有人因为讀書不当而助长了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今后我們当然更應該注意。

二、克服圖書排架混亂和防止丟失問題。讀者都能入庫，隨便翻書，人多手雜，書架是容易搞亂的。尤其是在剛開架不久，許多人抱着新奇的心情來到書庫內，看看這本書又翻翻那本書，翻看之後不一定都放回原處。開架後短時期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架上的圖書一點也不混亂是很難的，多想些辦法則可以減低混亂的程度。對讀者進行宣傳教育當然是一項主要的辦法。我們曾經採用集體的和單獨的方式，隨時向讀者說明圖書排架的意義，說明如果把書搞亂了，就會如飛鳥入林一樣不好找，這對許多人都不方便，給圖書館工作造成困難，且對讀者自己也沒有好處。只要得到廣大讀者的支持和幫助，事情就好辦了。同時我們還採取了“代書板”的辦法，即：讀者入庫時都要拿一塊小板兒，從架子上拿下書時就把小板兒插上。翻閱後，如果不想借，就取下“代書板”把書放回在原處。如果要借這冊書，則可取下“代書板”一同拿到借書處辦理借書手續。這種辦法如果能堅持，也是有效的。

為了使書庫不亂，館員就應當經常整理它，而不能在一天之內任其亂下去，等到晚間才來加以清理。實行開架後，排架工作是增加了，而且增加得很多。雖然如此，但這對圖書的檢查和對書庫的安全都有很大的好處。

書庫的安全，包括防止圖書的損壞、丟失和火災等，是要十分注意的。有人認為，整風運動使群眾的覺悟都有所提高，可能不會再發生意外的事故了。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因為人的覺悟是不會完全相同的。因此，在堅決相信群眾的大多数的同時，我們也要對一部分自覺性不夠的人多加以注意。其方法不外是：制定適當的入庫規則，動員讀者互相監督，館員常加檢查。我們應該這樣認識這個問題：圖書開架而放任不管，這並非對群眾的信任，乃是對人民財產——圖書的不負責任。

三、開架後圖書館員的工作問題。過去，讀者是通过目錄查找館藏圖書，館員幫助讀者選書取書；現在是讀者直接和圖書見面自選自取了。這樣工作方式的改變，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如讀者目錄還有用處嗎？館員怎樣幫助讀者選書呢？等等。我們認為：有人怕無人查目錄而不同意開架，是不應該的；同樣，由開架而要取消目錄，也是不對的。

事實證明，採取開架借書辦法後，查目錄的人是減少了，但也還有人用。允許讀者入庫，又有目錄的設置，對借書人是方便的。與此有關的是，開架後的館員不應該只是為讀者辦借書手續而不管其它，他還是要幫助使用目錄的讀者找書和取書，並利用機會向讀者宣傳推薦好的圖書。

允許讀者入庫後，有些同學可能在庫里亂翻亂看，看得高興就借，由此而造成無計劃的盲目讀書，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

圖書是圖書館的戰鬥武器，把哪些書借給哪些人，應該成為館員們經常關懷的事情。大學圖書館，尤其是綜合大學圖書館，由於系和專業的設置複雜，同樣一種書對所有讀者的用途是不一致的，例如文藝小說，對多數讀者只為一般讀物，而對中文系的師生則可能是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必備資料。圖書館員應該了解這些情況，適當掌握各種各樣的圖書，不要因為滿足了一般讀者的閱讀，卻影響了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需要。凡此種種都說明了，圖書開架不是減輕了圖書館員的責任，而是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圖書館員根據開架的特點，幫助讀者借書，向讀者推薦圖書，做好閱讀輔導工作。

開架借書有優點，但也存在問題，那麼這種方式究竟是否適用於大學圖書館呢？我館對這個問題尚在爭論中，還未得出最後的結論。但是，大部份同志認為如上所說的開架辦法，在我們圖書館是適用的。這是根據大學圖書館的特點——讀者有較高的文化，又都是本校的師生，根據我校圖書館的情形——書庫是分开設置的，以及考慮到圖書館的其他條件，從而得出的結論。當然，如前所述那些由開架而帶來的新問題，是必須注意解決的。

最後，我們也認為必須明確這一點：在圖書館工作中，有些方法適用於公共圖書館而不適用於專業圖書館，反之，也有些方法適用於專業圖書館，卻不適用於公共圖書館。就是同樣性質的圖書館，由於館內條件不同，各館也常常不能採用完全相同的工作方法。時間因素也很有關係，彼時可以用的方法，現在可能就不合適了。我們對待圖書開架問題也應該這樣來認識。因此，像有些同志那樣，不問時間、地點和條件，只從方法本身強調必須開架，或是堅決不同意開架，實際是把問題絕對化了，對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是沒有好處的。